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沈刚伯 著

史学与世变

海豚出版社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史学与世变

沈刚伯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与世变 / 沈刚伯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10-2386-5

I. ①史… II. ①沈…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6919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策 划: 吴兴文

责任编辑: 曹振中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6.5

字 数: 80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386-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缘 起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第一章开始，便昭示国人学习的起源，在一个“学”字。何谓“学”呢？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觉”，按现代人的说法，即为“启蒙”，小自国学中的蒙学，扩大至终生学习。有趣的是，班固之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将其解释为“效”，亦即今人所谓的“仿效”。班固从哲学上定义，许慎则从经学着眼。启蒙和仿效成为古人学习精神所在，直言之，启蒙为体，仿效为用，但启蒙无疑是学习的第一要义。

西方到19世纪为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时代。20世纪则是摒弃神的人的时代，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之花盛开。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媒介、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但是，学习的方法基本不变。变的只是如何将衍生的知识和媒介，甚至将意想不到的信息组合在最合适的地方。就像用关联性方式陈列书的书店，思考那本书旁边为何摆这本书等，想象一下摆书人的“观点”为何。这也是一种启蒙，它有着发散式的思维，使

外，还计划参加考古队前往埃及。由于北伐开始，沈刚伯的湖北官费停止，他只好拎着行李回国。

1927年，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等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真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

沈刚伯说：“历史是人类的教育，读史可以使人聪明。”“读书的第一步就是博览，然后，再将所读的连起来贯穿，返回到约，弄些小东西来研究。”“在人的一类学问中，需先研究历史。因为，一切文哲、艺术、宗教及一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某部分行为的研究，而历史更是古往今来整个人类一切行动的总记录，如能大致知道人类以往的状况，自然容易了解人类现在的行为。”

沈刚伯从不去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

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对此，他解释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辩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向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1942年秋，他继金毓黻出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之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讲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历史系。

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大历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刚伯应教育部长朱家骅坚请同赴台北协办台湾大学，相继受到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钱思亮重视，担任台大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间，他为推

进院务和提高学术水准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大文学院有六个系。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沈刚伯于1954年3月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台湾的中国历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李济、姚从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董作宾、毛子水、李宗侗等。

1957~1972年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主持东亚各国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鼓励和推进作用。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刚伯说：“‘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指出，史学目标在‘通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就是世变。史学要通世变，但也

常常被世变所通，结果‘一家之言’不成，自己却窘态毕现。”《史学与世变》是作者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虽然篇幅不多，但对于青年读书、学历史颇有助益。其中回忆董作宾、蒋梦麟、朱家骅三篇，使我们对五四那一代学者的治学与为人，有了更多了解。

目 录

I	史学与世变
18	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
28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41	历史教育的推广和简易的参考资料
46	如何学历史
54	说“史”
69	孔子的教学
74	孔子学说的门径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停顿
81	秦、汉的儒
105	方孝儒的政治学说
131	缓
136	怎样为自己准备将来
140	起义前后的见、闻、经历

- 161 对日本民族的三点愿望
- 166 大英帝国的没落
- 174 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
- 179 我所认识的蒋梦麟先生
- 186 追忆瞿先先生的言行二三事

史学与世变

今天欣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的大庆，我是专诚来道喜的，承李所长之命，在这儿提出一个问题来跟大家谈谈，尚望各先生加以指教。

今天我要提出来谈的问题是“史学与世变”。世界上有了人，就有历史，但是，有了历史，不见得就会产生史学。古代曾有许多文化相当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等，都产生过很优美的艺术，很玄奥的神学同很实用的科学，但是，他们统统没有能够产生史学，尽管他们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史料。这些文化都以神道为主，人世间一切的创造都附丽于宗教之下。像那样以超自然的势力为依据的文化是不会产生史学的。能产生史学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为本。那就是说，它承认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经过理智的考虑，而后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切结果都应自负责任，其动机与

影响才有供人研究之价值。这种研究便是史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化，实只有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希腊才有史学。可是这史学并不是在这两种古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是在那些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之后，而忽然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它们的政治结构濒临崩溃，社会组织大大动摇，经济生活和礼教活动都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才产生史学。

史学产生以后，物质环境仍然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这原因是不难推测的。因为人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这些新观念就形成了新史书中的各种重点，如，维护正统或鼓吹革命，阐扬神权或提倡民治，羽翼道德或崇尚自由，重视经济发展或注意社会动态，倡言国家至上或宣传世界大同，遵循进化理论或主张治乱循环，等等。凡此种种不同的中心思想大多数是受了旁种科学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其纯粹从旧思想中推演出来的偶亦有之，却是比较的少。

有了新的历史重心，当然对于旧史料会有新的解释，新的组合同新的价值。原来所认为史事上的因果关系，现在也许要找出新的线索和新的影响。有时还感觉到旧的史料不够用，因而必须重新从地下或古书中去发掘新史料，或者从旧有的传说，从国外的图籍，从别种有关的学科里面找出可做比较研究的材料。用新的史料，来配合新的重心和观念，就得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编着的书，一定有新的体裁。像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同新的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学，须得再变。如此日新又新地与时俱变，才能够使史学成为“人类的教育”。

中国产生史学，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修《春秋》，才正式产生史学。当时正是大变动的时代，东周的中央政权已经衰微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诸侯各自割据，成了无数的小朝廷，这是政治方面的情形。就社会变迁而言，则当时封建制度已开始动摇，中产阶级，尤其是士的阶级，渐渐兴起。他们已经打入政治界，并且开始掌握了一切学术。经济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候铁器的使用，已经增加了农业生产，同时商人阶级也起来了，他们的力量，往往可以影响到国内外的政治，甚至

左右军事行动。这时候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既然都起了大变动，旧有的礼教便自然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加以内则诸侯兼并，外则四夷交侵，成了干戈扰攘、沧海横流的状况。孔子在政治上倡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乃退而重修鲁国的《春秋》，想借这部历史，一方面保存过去人类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则用很简单精确的字句来表示那些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这就是所谓用笔削褒贬之法，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学。根据这种史学的义法，一般人便可养成历史思想，以为处世、论人、治事、立身的准则。中国文化也就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型。

秦汉统一中国，实现了“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理论，自然要进一步做到“行同伦”。于是汉武帝乃有罢黜百家以配合其政治上需要之举，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变迁导致了司马迁的史学。他综合以前编年、记事、记言、记谱系各种体裁，而创为五种新体例，用“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他这种编辑方法竟成为我国正史的典型。至于所搜集的材料之广博，更超越前代。他承认历史有继续性，因而追溯到他所知道的最古

时候起，一直写到他的当代。以“史”名书，使成为专门之学，在中国实自他起。根据上述的种种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我国第一位专门史学家。尽管中国史官之设很早，而且一般思想家如儒家、墨家、法家等对于历史都有他们独有的看法，但他们毕竟是哲学家而不是专门史学家。中国史学之高度发展实在是应该归功于司马子长的。后来西汉亡了，东汉继起。彼时政治、经济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过大乱之后，人心思汉，像班彪一类的读书人，为迎合多数人的心理，以谋社会之安定，认为应当从思想上维护刘姓的政权。于是他们父子兄妹乃根据“王命论”的立场，颂扬汉室之应天顺人，而修成《汉书》。这又是一个新的体裁，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史学界创下了断代的写法。从此以后，中国的史书老是断代的，每一代便成一书。看起来这似乎把历史的继续性抹煞了，但时间愈长，史料愈多，我们也实在不能不分成一段一段的来研究了。

东汉亡后，自三国一直到隋朝，是一个大变而特变的时代。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上，因外国民族之移入而使我们在种族融合方面发生大的变动，而且学术思想也因佛教之

东来与玄学之兴起，而起了大的变化，加以经济上的发展，与海外的扩张都超越前代。这种新文化解放了个人，注重到实用，使当时的学人们一方面吸收并融会外来的文教艺术，一方面更勤于搜集同整编旧有的典章图籍，于是乎史学的发达，乃突过前人。在那短短的两百多年动荡时代之中，写成的史书，在万册以上，关于一个朝代的历史，往往多至二三十种。著作的体例也大大地增加，有跟《史记》走的，有跟《汉书》走的；有取典章制度写成专书的，有把地方的风土人情、物产分类编辑成为后代所谓地方志的；有专以皇帝为中心写成起居注的，也有把当时的官品仪、注，或族姓谱系做成专著的；更有专写外国民族的。体例之多真是空前。这些书，虽然大部分佚失了，但看隋唐人所引用的东鳞西爪，可断定他们都是头等的著作。这证明了中国文化大变迁的时代，也是史学迈进一步的时候。

反过来说，时代安定不太变动，则史学反而比较沉寂，没有新的花样。唐代那么强盛，但史学远不如三国、魏、晋到六朝的时候。这是唐太宗控制思想的结果。拿破仑曾说，历史应该由政府掌握。他虽然看到这一点，可是并没做到，而李世民

却在他称帝以前将近一千二百年时早做到了。唐太宗设立专局，网罗当时的学者、高官来编修前朝历史，从此为中国开了官修国史之例。这当然比私人修史方便得多，因为政府所保存的档案，可以利用，而且以国家的力量去采辑散在民间的资料，也比较容易。许多学人藉此养成合作编修的作风，好祛私见而探众长，也许比一个人的著作更为博治公允。但坏处也免不了，因史家必须迎合皇帝的意旨，凡是当代所不高兴的事，只好加以删改，甚至往往歪曲事实，抹煞真相，以贬前代而夸本朝。这是官书不如私史的地方。唐朝修史的人既不完全自由，伟大的史学家自难产生。像柳子厚那样有奇特见解的人，也没办法修史，只好写短短的几篇文章而已。仅杜佑一人，能够做成一部巨作——《通典》，其体例实际上是在六朝时已经有过的，不过他踵事增华，总算差胜前修了。还有一个刘知几，他在史学上的见解，实在算不得头等，严格而论，只是一个文学词章之士，不过他能把史学当作一个专题来做，不能不说是为中国史学界创了一个新格。总而言之，在唐代文化极盛时候，文艺、经济、政法等等都有大的发展，可是在史学方面却反前不如南北朝，后不如两宋。